

阐释与

CHAN
SHI
YU

提升

TI
SHENG

文艺批评实践与思考

本书是两位学人近年来文艺批评实践的结晶，内容涵括了文学批评、电影批评，以及对于批评自身的反思。作者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大胆运用新视角和新方法，同时坚持求实的批评品格，对作品的分析与阐发达到了相当深度，颇具说服力。批评理论部分在实践的基础上展开，扎实而多有创见，对中国批评理论建设当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勇赴兴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阐释与

CHAN
SHI
YU

提升

TI
SHENG

文艺批评实践与思考

本书是两位学人近年来文艺批评实践的结晶，内容涵盖了文学批评、电影批评，以及对于批评自身的反思。作者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大胆运用新视角和新方法，同时坚持求实的批评品格，对作品的分析与阐发达到了相当深度，颇具说服力。批评理论部分在实践的基础上展开，扎实而多有创见，对中国批评理论建设当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阐释与提升——文艺批评实践与思考/勇赴, 兴华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7

ISBN 7-02-004186-8

I. 阐… II. ①勇…②兴… III. 文艺批评-文集
IV.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3028 号

责任编辑: 桑海 装帧设计: 柳泉
责任校对: 王鸿宝 责任印制: 周小滨

阐释与提升——文艺批评实践与思考

Chan Shi Yu Ti Sheng Wen Yi Pi Ping Shi Jian Yu Si Kao

勇赴 兴华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02-004186-8/B·267

定价 18.00 元

勇赴

兴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目 录

追寻神秘描写的隐在意义	1
——从民俗视角看《白鹿原》	
漫议中国文学中的神秘主义	10
——兼论贾平凹的《太白山记》	
《白驹》语言的形式意味	18
《古船》对家族意识的剖析	25
“蝴蝶”的魅力	32
新的审美视角	38
——《高山下的花环》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比较	
读者接受的秘密	49
——《廊桥遗梦》与《不是忏悔》之比较	
激情与冷峻:不同的文学精神	56
——前苏联、美国二战题材小说比较	
作家的艺术良心	68
——读巴尔扎克小札	
论井上靖战后初期的崛起	71
简议《黯潮》主人公速水的性格系统	82
井上靖短篇小说艺术谈	89
豆腐陀形象新议	131
——读印度古典名剧《沙恭达罗》	

日本狂言中的喜剧手法	139
中国电影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150
夏衍早期电影剧作述评	166
塑造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新银幕形象	190
——电影《高天厚土》编剧韩乃寅访谈	
鲁迅与外国电影	198
他揭开中日电影关系史的序幕	208
——田汉早期电影观新探	
夏衍与朱石麟的一次“秘密”合作	220
大陆与香港电影交流的新开拓	223
——谈李翰祥的率先合拍	
关于世界电影史分期问题的思考	228
卓别林接受有声片前后的新突破	243
——试论《摩登时代》与《大独裁者》	
影片《罗生门》主旨探异	257
对文学批评概念的学理分析	264
文学批评的文体要素及其规范要求	277
文学批评的基本定位和现状分析	291
尴尬的文学批评	295
小说的陌生化形态与读者的阅读态度	300
轻松的写作与不轻松的阅读	305
夏衍三十年代电影批评	310
论别林斯基的批评文体	329

追寻神秘描写的隐在意义

——从民俗视角看《白鹿原》

《白鹿原》之所以引人注目,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它通过白鹿两家的历史,写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秘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揭示这个文化秘密时涉及到的种种民俗生活相。对民俗生活的刻意描绘,一方面使作者改变了以往单纯从狭隘的政治视角观照历史的方式,一方面又使历史沉浸在特定的风习之中,在向人们展示历史的风云变幻的同时,又涉及了国民精神的混沌之域和隐秘角落。作品立足于时代、民族、文化、思想的高度,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世界:那里有芸芸众生在动荡的社会中变幻不定的随波逐流,也有睿智的贤人对儒家道统的坚守;那里有包含着民俗因子的正统文化观念,也有纯粹是在民众群体中自行传承下来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民俗世相。耕读传家、党派之争、族规乡约、家庭矛盾这些现实生活与敬天祭祖、传宗接代、神异传说、鬼魂作怪等等神秘现象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文化的内核、历史的规律就在这种氛围当中时隐时现,颇耐咀嚼。

白嘉轩作为一个具有文化意味的人物,是作者倾尽心力塑造的形象,从文化角度上说,他虽未必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潜移默化的熏染,已使他领悟了儒家文化的精义:内省、自励、慎

独、仁爱。这种文化意识最终都呈现在颇具民俗意味的行动上：重修祠堂，兴办学校，制定乡约，惩戒不守道德规范的小娥、孝文，与敢违父命的女儿断交，灾荒年收留鹿三及其家人……这桩桩件件民俗化的事项，成就了白嘉轩具有文化魅力的正直人格，也成就了作品对中国文化的独特反思……

然而若仅止于此，作品恐怕容易变成对某种观念的演绎，白嘉轩也很容易变成一种抽象的文化符号，只具有这一文化部落的骨骼而缺乏惟他独有的血肉。因为这个人物上述的行为都是围绕儒家正统观念而进行的“非个人化”行为。白嘉轩之所以血肉丰满，就在于作者不仅写他在正统文化意义上的作为，而且还写他在个人意义上种种与民俗中的神秘成分纠结在一起的活动，这种笔法既反映了非理性的思维对民族心理的巨大影响力，又表现了作家对历史的态度。“白嘉轩一生引为豪壮的是娶了七房女人”，虽然在小说的开篇，作者就向我们昭示了主人公这样的心理反应，但是在他接连娶妻的过程中，却未必真有这样的感觉。他不断娶妻绝不是为了创下一个“引为豪壮”的记录，而是基于一种“无后”的恐惧。传宗接代，也许是从最久远的时代流传下来的风习，它一直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人类个体的活动，积年累月竟逐渐衍化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戒条，只要你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中，你就得努力使自己合乎这个规范。白嘉轩为了接续后代，几乎荡尽家产，但妻子一个个死去，并不曾给他留下一男半女。这位命硬克妇的男子最终奇迹般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是因为终于给他生儿育女的仙草腰里系上了避邪的桃木小棒槌，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块具有白鹿精灵的风水宝地，并把父亲葬在这里。这种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民俗现象，不仅包含着人们传宗接代的现实要求，还包含着种种不可言说的神秘。风水、丧葬、占卜、巫术这些从古至今人们虔诚相信却

又无法解说的东西,一直潜藏在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它处在人类自身经验及理解能力之外,常以深奥莫测、波诡云谲的面容,让人在冥冥之中感到它的存在,却又无法用理性和知识去洞悉和说明它。它是一种朦胧的、非透明的、无从捉摸的东西,人们常常只能见其果而难觅其因,无法用理性对其做出终极的剖示”^①。生活中的神秘确实如此,但小说在进行这类的民俗描写时,并非只是为了展示那些无从解释的非理性现象,而是于神秘之中融进了作者布局的深意及对人生、对历史的感悟。这种描写一方面赋予了作品浓郁的文化色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和思维特色,另一方面又显示了作者在人生命运中感悟到的莫测与神秘。一个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奋斗,而是取决于某种机缘或某种非人力可以改变的宿命。就像白嘉轩,虽几番向命运挑战,但仍无法阻止妻子的相继死亡,只有到了那个特定的时空点上,才能在茫茫白雪之中发现那块蒸腾的风水宝地,才能从此时来运转,渐入高潮。人生如此,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朱先生对未来令人瞠目的预见明确地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同样包含着宿命的成分。如果说他用“翻烧饼的鏊子”形容风云变幻的白鹿原,还可算做是他对当时局势的看法的话,那么他那些神秘的预见却似乎显示了一种无法解释的宿命感。比如他以国民党旗上的“满地红”算定共产党要胜利;比如他在共产党将要胜利之时,不加任何解释便劝白嘉轩把土地送给别人;还比如那块令几十年后掘坟的红卫兵小将惊呼不已的刻着“折腾到何日为止”的墓碑,都包含着无法用理智解释的神秘感。似乎冥冥之中已有神灵预先安排好了一切,所有的历史只是按照这种安排出现的一种必然。《白鹿原》被公

^① 洪治纲:《追踪神秘》,《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认为是从文化视角观照历史的小说,在上述形象化的民俗描写中,无疑显露了作者对历史的态度。

翻开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谈神说鬼的并不少见。对这种根植在民族心灵深处的信仰和崇拜,以往的作家们并没有有意识地把它当做形成作品文化氛围的民俗来写,而是或猎奇述异,宣扬迷信,或借鬼神谈苍生,就事论事般地起着一种简单的教化作用,而且后者居多。在文学作品中,除最初的《搜神记》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以外,大多数作品中的鬼神形象都被当做人间形象的一种折射、一种类比,或表达人们某种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或劝善惩恶,或彻底地否定鬼神。从某种意义上说,鬼神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纯属一种可供选择的艺术技巧,它只是为明确作品主题或者表达作者愿望而设置。不管是《窦娥冤》、《牡丹亭》,还是《聊斋志异》、《李慧娘》,全都如此。《白鹿原》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作者把形形色色的神话、传说、巫术、鬼魂、预兆、预言等等神秘的民俗现象以一种混沌的状态表现出来,既使作品弥漫着文化气息,又于别开生面之中发散着耐人寻味的意蕴。且不说带有浓郁巫神文化色彩的白鹿传说,也不说料事如神、死后化为白鹿飘逸远去的朱先生,以及生前不守妇道、死后化为恶鬼引发瘟疫的田小娥,就连作为“人”的代表,堪称光明磊落君子的白嘉轩,也与生活中的神秘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奇异的描写,初读时也许只能体会到可读性上的意义,但再读时就不仅会发现其中马尔克斯式的魔幻色彩及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而且还会发现一些深藏在奇异表象之下的特殊意味。它突破了明确主题、突出人物个性的简单模式,呈现出了一个深邃开放的格局,读者在探寻的过程中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造,体会其中无穷的乐趣。

白鹿的传说带有非常明显的图腾崇拜的痕迹。那只神奇的

白鹿曾给人带来富庶平安,带来吉祥如意。为了占尽白鹿的吉祥,原来的侯姓兄弟分别姓了白、鹿,它表明了人们对神灵庇佑的坚信,也表明了兄弟二人携手并肩、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然而,同祖同宗的族人发展到了今天却已很难看到手足之情。他们因为内心的虚荣,因为自身的利益明争暗斗,努力使自己凌驾于对方之上。且不说贪婪躁热、急功近利的鹿子霖,就是人格几近完美、终身以仁义为追求目标的白嘉轩也不能免俗,他为获得那块风水宝地也曾费尽心机。貌似闲笔的神奇传说其实向我们昭示了人性的弱点,历史上争斗的缘由也因此不言而喻。如果我们只是孤立地去看这个传说,或许不会发现比神奇更多的东西,而一旦把这个传说放在与现实的对比关系中,并进而把这种关系放大到整个民族历史的风云变幻,我们便会吃惊地发现掩藏在外在根由下的谜底:人类在私利的蛊惑之下互不容忍,自相残杀,人的劣根性使历史充满了腥风血雨。

朱先生带有民俗崇拜中神的影子,具有较浓的抽象意味。与其说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如说他是作家文化理想的精神化身。他的体内孕育着白鹿的精魂,不仅飘逸有高致,而且奇异神秘。他既能淡泊处事,又能保持自己凛凛的气节;既料事如神未卜先知,又能顺应历史的发展,不强行改变规律。事关民生疾苦,他可以挺身而出;事关个人名节,他又能威武不屈。在他身上,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儒学最高境界,仿佛站在蓝天白云之上,历史时空之外,一览无余地俯视着人间俗界。他内在的品格铸造出了白嘉轩这个文化奇人,他生前死后的奇迹,又增添了作品炫目的魔幻色彩。应该说,对朱先生的描写是颇具民俗色彩又暗合了中国的文化心理的,他的神异让人惊奇不已,又让人坚信不移。在我国民间信奉的神秘文化中,能知生前身后事的神人一直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它浸染着民族的生活,直到今天仍常为

人津津乐道。但是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记录生活中的某种事实以营造出特定的文化氛围,也不仅仅是为了竖立起一个抽象化的符号以表现某种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他是作者考察历史的一种参照。拨开迷雾,我们在朱先生奇异的生命中看到的,是包裹在超现实面纱之下作者心中的世俗愿望——返璞归真,淡泊处事,以及作者对不可能实现这种愿望的形象描摹——文化精髓无奈而必然的失落。尽管朱先生对世事有洞若观火的明察和预见,但在宿命之中他却只能化作白鹿飘然远去。他的仙去代表了一种高蹈文化的消失,而他离去的时机一方面暗示了文化从何时开始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则暗示了“砸烂”、“打倒”出现的某种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朱先生是民俗中的神的话,田小娥则是以民俗中鬼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生前,她因不守妇道而受到封建道德的维护者、族长白嘉轩的当众责罚,她破罐破摔,不断地勾引男人,终于被忍无可忍的公公鹿三所杀。死后,她化为鬼魂,先是以一种超现实的现象向婆婆和仙草展示她身上的血窟窿,表明她凶死的经过;接着又附在公公身上一面向白嘉轩挑战,一面使杀她的鹿三整个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最后,她又在白鹿原上引发了一场大瘟疫,造成十室九空的惨剧。她活着,算不上一个好人,她死了,又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恶鬼。在我国的民俗信仰中,凶死会变成厉鬼、恶鬼,以整个人类为祟害对象,而冤死者变鬼却只对仇人进行报复,是死者生前未了的矛盾的继续和延伸。如果从这一点来看,田小娥当是冤鬼变成的恶鬼。正如她生前是在封建道德所织就的罗网逼迫下一步步走向堕落一样,死后她也是在本应对她的命运负责,但却不肯对她的凶死付出一丝同情的境遇中一步步地变成与人类为敌的恶鬼。田小娥的命运,不仅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同时也说明了人在走

投无路的绝境之下会爆发出怎样的超常之恶。它已不是合理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是把恶的魔爪伸向各个角落，盲目地滥杀无辜，肆意施虐。在恶的张牙舞爪中，深植于民族心底的对鬼魂的恐怖弥漫开来，鄙视过田小娥的，竟生出了膜拜的愿望，而敢于与恶鬼对峙的却只有信念刚直、浑身正气的白嘉轩一人。小娥的鬼魂附在鹿三身上向他挑战，他便请法师把鬼魂赶跑；鬼魂夺去他妻子的生命，他仍不向鬼低头；待村人与鬼同心，他却不顾众怨，在小娥的旧居上造起高塔，让鬼魂永远不见天日。塔的建成及荒草中小飞蛾的一并烧灭，使鬼魂再无声息，也止住原上的这场瘟疫。尽管作品以“瘟疫是随着冬天的到来自然终止的”言说，暗示了瘟疫消失的真正原因，从而消解了上述民俗描写中的迷信意味，但显露着中华民族鬼魂观念的描写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置白嘉轩于一个特殊环境，让他在充满心理恐怖的氛围中依旧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人。人可能很容易战胜看得见、摸得着的手，但却不容易在不可捉摸的神秘中把握自己。白嘉轩与鬼魂的争斗，不仅表现了他的坚忍（丧妻）、仁厚（收留鹿三）、正义（造塔镇鬼），而且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人的人格魅力。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惊奇的慨叹，而且还有衷心的赞美。

田小娥从人到鬼的故事，其实还不止于对白嘉轩形象的衬托，它还使我们看到了人心的投影：多数人都麻木不仁，善恶不分。小娥被当众责打，众人口不出一言，均以为理所当然，没有谁设身处地地考虑衣食无着的小娥在黑娃走后以何为生，是否受人欺侮；小娥做了刀下鬼，众人又都漠然视之，均以为活该如此，没有谁想到该去追查杀她的凶手，为她讨个说法。直到大瘟疫发生，不可捉摸的灾难铺天盖地而来，众人在失去生命的恐惧中才猛然意识到小娥的价值。于是，这个昔日遭人唾弃的“淫妇”、“婊子”，因是具有巨大能量的鬼魂而神圣起来，他们坚信无

形的鬼魂是灾难横生的原因,根本不会想到那被弃之不管而腐烂发臭的尸体是滋生瘟疫的源泉。他们谄媚讨好,不仅答应给恶鬼“烧香磕头”,而且还愿“抬灵修庙”。善与恶的界限、正与邪的分野,就在这缺乏正气、懵懂盲目的情态中变得模糊不清,生活也就成了任意的随波逐流。在长长的历史进程中,多少世事不是如此?人们在社会的大势中被裹挟,盲目地崇拜、盲目地跟随,理性不参与选择判断,或者理性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如白灵、鹿兆海扔钱定政治路线的游戏,一如黑娃一生飘泊不定的游走……

与人物有关的民俗描写,把白嘉轩、朱先生、田小娥,置于人、神、鬼三个层次上,既使人物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浓厚的文化意味,又让人物在较量对比中呈现了性格中的复杂因素。朱先生参透玄机,却又无奈归去;白嘉轩一身正气,却以礼教抹杀人性;田小娥以恶抗恶,又惹人同情。在民俗氛围与现实活动的联系中,作者为我们写出了善恶交织、正邪相混的现象世界,也挖掘了人性中的难以作出明确判断的复杂因素。这种描写没有把我们的目光局限在事实本身,而是进一步引导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让我们从不同的层次去反思人生和历史。作品帮助我们体味了人性、人生及历史方面的内在规律,同时也让我们体察到了作者造出不凡胜境的非凡笔力。

在文学史上,描写风土人情、涉及神秘奇异的文学作品可以举出不少,但建国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把鬼神等一些神秘主义现象写进文学作品的已不多见。作家惟恐掌握不好尺度落下宣扬迷信的嫌疑,所以常常正面批判或避而不写。但是,这些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无形的心意民俗,并不因人的回避而从人的心理领域中消失。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神秘现象作为生活的一个侧面又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文学世界,但无可否认的是,

许多作品中的神秘带有一种刻意营造的人为痕迹,与现实生活有着明显的间距。《白鹿原》却不是这样,它所描绘的神秘天衣无缝地消融在生活的混沌状态之中,在保持生活原汁原味的同时,既展示了影响人物性格和命运的非理性及其强大的支配力,又透露出了从这一视角观照历史的独特魅力。这种写法给人以陌生化的惊奇感,因为它淡化了具政治倾向的理性意识,让历史呈现出立体、多元的面目,消解了以往描绘历史的片面立场。它弥补了艺术审美表层化、平面化的缺陷,拓展了小说的艺术深度。

(兴华)

漫议中国文学中的神秘主义

——兼论贾平凹的《太白山记》

中国人信神秘，古今皆然。翻开文学史，充满神秘色彩的描述几乎贯穿了文学史的长廊：星化人形，梦兆人事，人鬼相通，蛇狐为仙。从六朝志怪到今日小说，我们总能发现一些难以捉摸的神秘力量与人相伴。赤的头颅在汤镬中三日三夕不烂，直到仇人之头入汤，才变得不可辨认（干宝《搜神记》）；霍小玉死后化为厉鬼，令负心的李益家无宁日（蒋防《霍小玉传》）；窦娥含冤负屈，她的鲜血逆上旗杆，并带来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关汉卿《窦娥冤》）；杜丽娘死而复生，与梦中的情人永结连理（汤显祖《牡丹亭》）；《聊斋志异》中的神鬼狐仙就更不必说了，魂化促织（《促织》）、深入冥府（《席方平》）、狐侠助人（《红玉》）、花仙显形（《葛巾》）集成了一个神怪的世界。几乎每个朝代的每一本故事都在不倦地书写着无法解说的神秘事件，就连我国古典文学的最优秀篇章——四大名著也津津乐道于此。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无限神通的孙悟空，天罡地煞云集梁山泊，太虚人间相对应的《红楼梦》，亦真亦幻，把人带入了一个让人不胜惊奇却又惆怅迷离的世界，它是现实的影子，却渗透着无法参透的人生玄机。

神秘作为一种超验的存在，总是处在人类的自身经验及理解能力之外。“它常常以其深奥莫测、波诡云谲的面容，让人在

冥冥之中感知到它的存在,却又无法用理性和知识去洞悉和说明它。它是一种朦胧的、非透明的、无从捉摸的东西,人们常常只能见其果但难觅其因,无法用理性对其做出终极的剖示”^①。世界向人类展示了许多神秘之事,文学便录下了它的面貌并抒发着对它的感想。不同时代的作品有不同的侧重,于是神秘描绘在文学中便有了不同的意义。

魏晋时期,志怪小说作为文学的一支,专以记述神秘事件为内容。其最初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②,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③。鲁迅先生也曾谈到:“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④。在小说创作尚没有达到完全自觉的时代,初时的志怪作品只是记录人间异事,反映着人对神鬼等超凡世界不折不扣的信仰。植根于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下的中华民族,信神、信鬼、信命、信巫——信一切神秘的东西。对一切无解之谜,人们一面怀着恐惧和敬畏,一面又不断地困惑和浩叹。人在世界中总会遇到看不见的支配力量,它无从解释,却又可以感知,所以,只有用虔敬之心对待鬼神,才能获得一生的安宁。你看《搜神记》不是告诉你,遵守了知天命、善卜易的管辂之言,颜超便延了性命(卷三),而违背了司命之吏三年不出门的嘱托,周式便果然失了生命么(卷五)?虽然这本小说中的许多故事也可以与反抗暴政(如《干将莫邪》、《韩凭夫妇》)、追求爱情(如《吴王小女》、《董永》)等社会意义联系起来,但其引导的指向仍在于让人

① 洪治纲:《追踪神秘》,《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② 干宝:《搜神记·序》,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③ [英]吉尼斯:《心灵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